

北站區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在延安的日子里

我的父亲杨天恩

忆杨璞

我们怎样将新乡敌陈堡镇武装拉出来的

凤凰山下的明珠——新乡火电厂

新乡化纤厂技工学校记略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乡市北站区委员会

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北站区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(内部刊物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新乡市北站区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

EC76 13
政协北站区学习文史委员会

岳少男 副主席主管

主 任 (缺)

副主任 李树德 (兼)

成 员 刘伯涛 邹 琦 胡秀荣 张建华

《北站区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顾 问 刘万兴 王守义 郝祥粹

编 审 贾新德

主 编 刘伯涛

副主编 李树德 李 砣

编 辑 张建华 郝振环 李景文

孙 捷 邹 琦 胡秀荣

校对 岳少男 刘伯涛 李树德 李 砣

广泛征集文史资料
为振兴北站服务。

李纯正
九一年五月

中共新乡市北站区委副书记 李纯正题词
新乡市北站区人民政府区长

高举爱国主义旗帜
搞好文史资料工作

刘万兴

一九九一年五月

政协新乡市北站区委员会主席刘万兴题词

目 录

前 言

在延安的日子 (1)

 杨万贵口述孙捷郭文峰张建华整理 (3)

回忆父 亲 杨天恩 杨秀琴 (13)

忆 杨 璞 杨政撰稿李树德整理 (18)

忆 二 哥 杨 璞 杨秀琴 (32)

回忆解放前夕我和杨璞同志的交往

..... 杨士河 (37)

我们怎样将新乡敌陈堡镇武装拉出来的

..... 杨璞遗作 (45)

忆 亲 人 杨 宗 太

..... 杨玉学杨玉广杨玉宝 (58)

• 北站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活动

..... 宋维乾口述李景文整理 (64)

• 郝浩章烈士事略

..... 郝珍章口述郝振环整理 (68)

从事地下工作回忆片断

..... 郝珍章口述郝振环整理 (71)

赴 緬 抗 日 前 后

..... 张文明撰稿李树德整理 (75)

山城货栈

.....李孟春口述李砭整理 (80)

凤凰山下的明珠——新乡火电厂

.....焦守信乔庆文执笔 (83)

郭柳柿子.....岳少男 (89)

愚公泉的发现.....岳少男 (98)

北站民办教师小史.....李砭 (108)

我的教师生涯

.....冯省民口述李砭整理 (113)

新乡化纤厂技工学校记略

.....孙捷郭文峰执笔 (118)

三鲁堡.....张建华 (134)

鲁堡学校.....王献良 (139)

黑龙潭沟.....何振清 (145)

编后赘语..... (149)

前 言

征集、整理并编印文史资料，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。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，不仅可以弥补历史文献不足，更好地为研究历史服务，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，而且对于加强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，团结人民，教育人民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，帮助人们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，保证社会稳定，促进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等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；同时，必将发挥“有益今人，惠及后人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”的作用。

我们在编撰《北站区文史资料》的过程中，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。从学习文史委员会的成员到文史资料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，从政协委员到各界人士，高举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的两面旗帜，实事求是，质量并重，废寝忘食，孜孜不倦，撰写了很多史料，做了大量工

作。区党政领导对本辑《北站区文史资料》的整理出版工作，给予了极大地关怀和支持。在区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刘宗德副区长千方百计筹措资金，使之得以按时出版。在此，仅向参与、支持、指导、帮助过本辑搜集、整理、撰写、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《北站区文史资料》一、二辑的问世，在北站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在北站区的文明建设、青少年教育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中起到了一定作用。我们相信，第三辑文史资料的面世，将在教化和资政中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。鉴于文史资料编辑部人手少，且金系兼职，各自有其繁重的本职工作任务，加上水平有限，疏漏之处恳请各界人士指正。

编 者

1991年4月

回忆录

在延安的日子

杨万贵口述 孙捷 郭文峰 张建华整理

我1917年出生在陕西省延安地区安定县，跟与刘志丹齐名的革命领导人谢子长同乡。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攻占安定县。是全国第一个由红军打开并占领的县城。1935年春天，谢子长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受伤牺牲。后来，为纪念谢子长同志，改安定县为子长县。毛主席到陕北后召开重要的瓦窑堡会议，会址就在我们县。

延安地区在黄土高原上，遍地是黄土，处处是土岭，上边是田地，下边是窑洞，老百姓世代代代就住在窑洞里。

旧社会，我们家乡穷，我家更穷。爷爷、父亲都给地主扛长工，我从7岁开始就给地主景巨江家放羊。那时候，富人家说穷人“没有天没有地，走的路都是我们的”。真是拾柴拾粪都没处去，更别说上学了。家里祖祖辈辈没人上过学，斗大的字不认一升，没文化常受富人欺负，有时

交租子，地主开条欺骗了咱，咱还蒙在鼓里呢。后来，家乡有了共产党，领导穷人闹革命，我这样的穷孩子才有了学文化的机会。在我15岁那年冬天，听说外乡来了个教书先生，父母想，过去咱不识字，处处受压迫，受欺骗，就让孩子去读几本书认几个字吧。她抚摸着我的脸说：“就是饿肚子，我和你爹也要供你上学。”就这样我用几十斤小米做学费上学了。说是上学，其实是私塾，只有四五个学生，连课本也没有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等五本书都是手抄本。穷人家孩子上学只能利用冬闲时间，我每年冬天学习两个半月。可是，才上了两个冬天，老师被敌人杀害了，我便失了学。事后才知道，这位老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

我1935年参加革命，并加入了共青团。当年冬天，我们家乡进行了土改。那时，在我们那里，识字的人是很难找的。我读过几天书，又是共青团员，就当了乡团支部书记，领着15—18岁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参加土改，斗地主分田地。我还到外乡斗过恶霸地主薛华莹。穷人们分了他家的粮食、羊绒、家具等。我1937年入党后，在家乡先后任过赤卫队连长和乡党支部书记等职。

当时规定，乡长等行政干部才有微薄的“月薪”，而支书等党的干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。共产党员要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嘛！1943年，我这个乡党支部书记代理了文书，才有了一斗小米的“月薪”。那时候真是党咋规定咱咋执行，心中想的就当干部应该吃苦在前，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很少有私心杂念，谁也不搞歪门斜道，都很干板直正。按组织规定，党内一些活动谁也不能乱说。大家自觉地遵守严格的纪律，都守口如瓶。有很多次，连家里人也知道你到哪里去了，干啥去了。为的是不泄露机密，不让坏人钻空子，不使革命受损失。

1943年七、八月份，我到了延安，参加了地区干部学习班。那时候延安的干校多了，光中央干校就有7个。1944年初到地委后经过整编，把我留在了地委工作，当通讯员，收发信件，油印文件。

由于国民党的封锁，延安条件十分艰苦，一个月吃一顿白面算改善生活，每逢那天，大家都乐得象过年似的。一次，有个连队的同志太馋了，杀了条狗来改善生活。他们把狗肉切成小块，放在小米饭中煮，夹起来吃时，因为没有调料，淡

淡的，啥味道也没有，可战士们硬是津津有味地把它一口一口吃了下去，嘴里还说着“好香”“好香”。

住在山上的同志，多了个吃水的困难，更艰苦。连水壶和脸盆这样的日用品都没有，用水是几个人抬一个瓦盆，从山下抬水到山上，一不小心就会盆打水流。所以，大家用水非常珍惜。哪象现在的人，水龙头大开着，水哗哗地流掉也不去关。

那时候想讲卫生，可没钱买牙膏和毛巾。我们都是用盐水刷牙，牙刷还是自己造的。我用的毛巾是一块土布。说起来不怕大家笑话，我在延安四五年只洗过一次澡，还不是在街上澡堂里，而是解放日报社（后来改为人民日报社）的同志们帮忙，用他们的大铁锅为我们烧了开水，倒到石头槽里洗的。

说到住宿，再简单不过了。床就是一块水板。被褥嘛，盖的是我离家时带来的一条破被子；铺的是我从家里拿来的一张狗皮，几年来又当褥子又当单子，最后毛掉完了，只剩下一张光光的狗皮。招待所房里总该好一点吧？不，也只有几个凳子和与我那水板床一模一样的“床”。

在延安几年，我没进过一次饭馆子，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没有给过家里一次钱。好不容易买了一块日光牌肥皂，还送回家里尽了孝心，把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儿。现在的人可能不相信，这都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这些本地干部两年发一套棉衣，一年发一套单衣，大小干部都不发鞋，不发津贴，我穿的鞋还得从家拿。外来干部，每人每月发一元津贴，每年还多发二斤毛线，让织毛衣毛袜，算是对他们的特别照顾。

记得延安地委书记李景应同志有个亲戚病了，他叫我想办法为他买点点心。我就借钱去南关大街买了二斤点心回来。看病人送一斤点心不算多吧？可李书记说：“我想着买1斤就行了，你买二斤得花多少钱哪！怨我没说清楚，你去把这一斤退了吧。”这一下可让我作了难，人家给包得四棱八角的点心，不馊不坏，不短斤少两，咋能退呀？况且，从东关到南关，往返一趟十余里路，那时别说坐汽车，连自行车也没有，全靠两条腿呀！不容易也得去，那时候旷花一分钱也不行，哪象现在有些人浪费个百儿八十元的不在乎？我硬着头皮走到那家糕点铺，好说歹说退了一斤点心。李书记就用一斤点心看了病人。

可正是这些经过各种艰难困苦磨炼的革命者，战胜了千难万险，锻炼了钢一般的意志，铁一般的心。再穷再苦，我们这些人精神是充实的，眼睛是明亮的，干革命的一颗心是铁定了。

1945年以前，经常行军打仗，一天只吃两个窝窝头，既没菜又没盐，苦得很呐！可能今天有人会问：当时不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吗？红军不是被编成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应该有军饷吗？咋会苦到这种地步呢？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当时蒋介石只是口头答应给我们军饷，而实际不供给我们吃穿，不供应我们枪支弹药，想把我们饿死、冻死，想让日本鬼子吃掉我们。要说啥也没给似不确切，为掩人耳目给过两个月军饷，还以宋美龄的名义给每人发过一件背心。

说实话，那几年，经受了生活的磨难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涩，啥滋味都尝过了。生活苦，条件差，困难多，但抗日的决心没动摇。大家都明白，要是做了小日本的亡国奴，那真不知道要遭多大的罪！因此，为了不叫饿死、冻死、因死，为了不当亡国奴，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，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生产自救，一面打仗一面生产。当时毛主席提出“自己动手，丰

衣足食”的口号，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。他说：你要把我饿死，我有自己的兵，自己的人民种地。于是，整个延安地区到处开荒种地。机关种，学校种，一家一户种，几家联合起来种，连中央各部门也行动起来了，大家都搞生产自给。比如为了解决穿衣问题，人人都纺线织布。中央领导住在杨家岭，杨家岭的纺车有三四十种，还有土造的织布机。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有自己的纺车，一旦没事就坐下来“嗡嗡”地纺线。我也作了一架纺车纺线。那时候，听到“嗡嗡”的声音，真比听歌、听戏、听音乐还舒服。

1940年，解放了延安南面的10个县城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。第二年，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来到了延安南边50公里处的南泥湾搞生产。

南泥湾是个小盆地，长宽各三、四公里，一圈荒山，中间是毛森林，经常有成群的野猪出没。三五九旅来到的初期，一天两顿饭都吃不饱，更没有象样的服装。实在没吃的了就猎野猪，打野鸡，挖野菜。没军装，就把土布用树叶染一下，黑不溜秋的，只要能蔽体挡寒就行。没房住，就自己动手搭窝棚，挖窑洞。就这样，经过几年开荒地，种粮食，辛辛苦勤的劳动，终于把荒凉的

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。1944年收的粮食4年都吃不完。当年秋天，三五九旅奉命调往前线，走时留下三、四万斤粮食。三五八教导旅驻进了南泥湾，继续搞生产。这时，我被调到那里任农场场长。我是部队移交后的第一任场长，领导孙树林和南泥湾两个农场。那一带农场多，一个农场才五六个人，七八十亩地。农场养猪羊，种庄稼，谷子、小麦、稻子、玉米等啥都种，一人一年平均收七八千斤。

延安一带适宜种谷子，当时党中央提出，农场每人每年必须完成600斤小米。搞纺线、织布、种菜、烧炭的，每天完成的生产指标也要折合成小米计算，合起来每年也要相当于600斤小米。当年，三五九旅就搞了一个毛纺厂，用羊毛纺呢子。质量当然没法跟现在的呢子比。粗糙的给战士做军衣，稍好点的给领导干部用。1944年10月，在延安召开劳动模范会，我这个地委“先进工作者”得了一条毛毯，当领到自己的毛呢厂生产的毛毯时，心里真是美滋滋乐滋滋的。

由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，延安的军民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，粉碎了蒋介石置共产党于死地的阴谋，粮食、蔬菜和工业必需品，均